

文章编号:1674-8107(2022)06-0107-08

中央苏区时期的社会改造与宣传动员

蒋玉芳¹, 肖小华²

(1.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江西 井冈山 343600;2.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江西 井冈山 343600)

摘 要: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把社会改造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以有效的宣传动员为引领、以切合实际的制度为保障,既发挥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导作用,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击碎封建宗法关系,解除人民群众的身心枷锁,重构了社会结构,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

关键词: 中央苏区;社会改造;宣传动员;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2.06.013

地处江西赣南、福建闽西、广东粤北的原中央苏区所在地,在上世纪 30 年代前后,由于生产力落后、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等原因,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尽管受过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洗礼,但封建社会的思想遗毒及陋习恶俗还固守于广大群众头脑和言行之中,严重地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根据地的建设。为彻底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击碎封建宗法关系,解除人民群众的身心枷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的同时,还加大了社会改造力度,以有效的宣传动员为引领、以切合实际的制度为保障,重构了社会结构,促进了土地革命的深入。总结分析中央苏区社会改造经验,对加强和创新当前的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加大土地革命政策的宣传力度,摧毁了封建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有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火热的土地革命浪潮之中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与全国其它农村一样,革命前的中央苏区大部分土地被地主占有,农民缺少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得不向地主豪绅和公堂租地耕种。“中国农民生活,比任何阶级都苦;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任何阶级都深,这些痛苦和压迫的来源,土地问题,便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而乡村的一切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当然也就都是建筑在这种经济背景之上,成为封锁农民群众的桎梏。”^{[1](P257)}所以,从根本上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内容,是凝聚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阶级基础的需要,更是重构苏区社会结构的前提条件。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先后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在不断完善土地革命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上,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大了土地革命政策的宣传力度。

一是以通告的形式,把土地革命的政策告知于苏区群众。1931 年 2 月 8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

收稿日期:2022-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央苏区的宣传动员及其时代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1XDJ029)。

作者简介:蒋玉芳(1978-),女,江西井冈山人,馆员,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肖小华(1967-),男,江西吉安人,教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研究。

发布了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通告明确指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方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2](P372-373)]同年2月27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规定：分田后“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3](P90)]据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等发布了《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之布告》《土地是我们的，耕种起来啊》等文告，正式宣布已经分配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以文告的形式告知于苏区群众。

二是把土地革命政策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潋江居住期间，主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制定了著名的《兴国县土地法》，宣讲了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培养了一批土地革命的领导干部。此外，马克思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等干部培训机构，也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土地革命政策作为当时重要的教学内容。

三是苏区报刊等重要媒体积极宣传土地革命政策。1930年5月，《土地暂行法》颁布后，第107期《红旗》及时予以发布。1932年4月13日第17期《红色中华》刊登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几句重复话》一文，该文以信丰县、南康县在执行土地政策中出现的问题为例，对苏区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解释，澄清了一些模糊认识。^[4](P301-302)]

四是通过歌谣、戏剧、标语、漫画、会议等途径把土地革命政策通俗化、大众化。如书写“劳苦的工农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豪绅地主回来收租逼债！反对国民党收粮抽收苛捐杂税！”等标语。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还创作了大量的关于土地革命的歌谣。“米镬有方又有圆，欢迎分田众委员，米镬香来米镬甜，分田分地笑开颜。绿插茶来甜小酒，贫苦农民家家有，分得田地

夺丰收，你敬茶来我敬酒。”^[5](P22)]这首歌谣描写了农民分得土地后，家庭生活发生变化的喜悦心情。类似这样的歌谣还有如《兴国分田》《闽西农民分田歌》《耕田证》《红军发给土地证》《分田分地乐陶陶》《共产党来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回老家》《共产党来分田地》，等等。这些歌谣大多数是农民分得土地后自发创作的，真实地描绘了农民分得土地后过上了幸福生活的喜悦心情，语言朴素，简洁明了，朗朗上口。

土地革命政策的有力宣传，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从而在根本上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引发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地主作为一个阶级因此被消灭、宗族势力因此被削弱、农民和贫雇农因此成为社会的主人。

二、加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宣传教育，瓦解了封建宗族社会结构，有力地动员了人民群众参与到新民主政权建设之中

“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6](P31)]革命前的中央苏区，其社会组织结构主要是由血缘关系维系而成的封建宗族制，乡村的封建宗族统治严密，宗族势力强大，并在封建宗族制度长期影响下，苏区居民地方观念、姓氏观念浓厚。毛泽东曾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感慨到：“无论那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6](P69)]各县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6](P74)]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根据地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因此，肃清封建宗族观念、摧毁封建宗族势力，是重构苏区社会结构的首要任务。1934年9月23日第237期《红色中华》刊载的《人民委员会关于边区战区工作给各省县苏维埃的指示信》中强调：“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思想习惯彻底改造，来适合于这一新的环境，来负担这一伟大的任务。”^[7](P3988)]

为摧毁苏区农村的宗族势力,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通过土地所有制改革,摧毁了封建宗族势力的经济基础。《苏维埃土地法》明确规定:“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需要的贫民使用。”“所有豪绅、地主、富农及祠庙公田的一切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8](P759-761)}另一方面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动员,着手从思想上对苏区群众开展阶级观教育,激发他们对地主、豪绅、恶霸的阶级仇恨,在思想上根除苏区群众头脑中的宗族观念。

一是加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宣传教育,以树立苏区群众的社会角色意识。在出版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苏区先后编辑翻印了许多马列主义理论通俗读物,如《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同时《红色中华》等报刊刊载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文章,加大宣传了人人平等、个个都是社会主人等的唯物史观教育。

二是加大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中央苏区时期,党、红军、苏维埃政府不仅颁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布告通告,而且还通过标语、墙报、传单、戏剧、歌谣、漫画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党的主张、任务、性质、宗旨进行了宣传和解释。如歌谣《共产党的三大任务》中唱道:“驱逐那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完成那真正的统一战线。伟大的土地革命彻底实行,消灭那封建势力束缚我们。打倒那一切顽固统治阶级,建立起工农兵苏维埃政权。”^{[9](P260)}

三是加大红色政权下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宣传力度,告知苏区群众红色政权不仅能够满足大家的现实诉求,而且还能实现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以激发苏区群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苏区的各项建设之中,如歌谣《共产社会乐如仙》中唱道:“共产主义乐如仙,乡乡也有新剧员,宣传白话并游艺,弹弹唱唱真自然。”^{[10](P375)}

四是加大了群众性组织性质、作用的宣传力度。如为动员苏区群众加入“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保障春耕运动的顺利进行组织犁牛站的办法》《关于组织犁牛合作社的训令》等文件。《红色中华》等重要媒体除对这些文件进行转载外,还加大了相关典型事迹的报道力度,着力营造人人参加合作社的氛围。如1934年4月27日第167期《红色中华》曾称赞瑞金叶坪乡犁牛合作社是“模范犁牛站”。^{[11](P2993-2994)}

五是加大了阶级情谊和阶级意识教育。如称劳苦大众为穷苦兄弟、白军士兵为白军弟兄,着力灌输天下穷人是一家的阶级观念,“逐步使苏区群众的身份认同准则从血缘向政治经济地位转变,从而加强了政治经济地位相似、同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间的凝聚力,提升党和红军对工农大众的向心力,从而实现了对广大群众的资源整合。”^{[12](P257)}

六是揭露了族长、户长以及地主豪绅假公济私的丑恶行径。如歌谣《土豪恶》中唱道:“土豪恶,土豪恶,有田有地好剥削,到了秋冬去收租。不但收租去剥削,米谷留到过荒天,抬高米价心更恶。将钱借给人,重利去剥削。讲到禾利放谷银,刁难穷人更加恶……土豪恶,土豪恶,坐着享福好快乐。吃洋烟,打麻将,巴结劣绅好作恶。”^{[10](P45-46)}歌谣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绘了地主恶霸的丑恶行径,用群众经历、感悟的事情教育引导他们学会用阶级的观点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

在制度建设和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党和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保证了“一切劳苦大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并动员苏区群众积极参与政权管理。同时,引导苏区群众建立了许多群众性组织,如工会、贫农团、妇女代表会、共青团、互济会等一系列群众性社会组织,凸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三、加大科学文化宣传教育,阻止

了封建迷信活动的蔓延,有力地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投入到学文化用科学的热潮之中

“封建头脑人,多半迷信深。分明是染病,却说是掉魂。请道士做解,叫端公降神。吃斋和拜佛,求和尚念经。叫瞎子算命,接阴阳过门。”^{[13](P468)}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普遍缺乏科学知识,加上长期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蒙蔽和麻痹,革命前甚至在根据地建立后一段时间内,许多苏区群众封建迷信思想浓厚,热衷于祭拜、祈求、看风水等迷信活动,以求生活平安、物产丰收、子孙荫庇。他们认识不到自己被剥削被压迫的根源,故逆来顺受、安于现状,把命运的改变寄希望于求神拜佛,缺乏抗争精神和革命的主动性、自觉性。这些迷信思想不仅严重影响了苏区群众的身心健康,而且影响了苏区革命的进程。

为阻止封建迷信活动在苏区的蔓延,消除苏区群众的迷信思想,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从经济、政治、立法等方面着手,摧毁宗教迷信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如在政治上,取消了牧师、僧侣道士、地理阴阳先生等以搞宗教迷信活动为生的人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法律上加大对从事宗教迷信活动分子的惩处力度;在政策上要求各地“不许还愿打醮、立教传徒、募捐建筑庙宇,以及一切影响苏区治安的集体行动等……勒令和尙道士尼姑以及看相算命的人,改换职业。”^{[14](P137)}另一方面通过多种形式对苏区群众加强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肃清了他们的迷信思想。

一是在苏区重要报刊上刊登科普文章以及苏维埃政府关于严禁宗教迷信活动的相关政策。如1934年4月17日第176期《红色中华》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就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利用宗教迷信,煽惑居民,破坏苏维埃及其法令者,处死刑。其情形较轻者,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11](P3160)}

二是通过俱乐部、夜校、识字班以及戏剧、话剧、歌谣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形式,加强苏区群

众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大力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告诫苏区群众生病后应及时就医,不要祈求神灵。如歌谣《革命时调》中唱道:“三月里来是清明,莫做公堂敬鬼神,香烛纸钱你莫用,浪费银钱没有灵,大家迷信要打破,齐心革命打敌人。”^{[10](P75)}

三是对一些迷信活动进行批评。如,1934年1月10日第142期《红色中华》第4版发表了《云集区列宁小学教员拜老爷!封建旧戏大演特表演!》对长胜县云集区列宁小学的迷信活动给予了严肃批评,文章结尾指出“旧戏是过去剥削阶级麻醉工农劳苦群众的思想、用以作剥削的工具。”^{[15](P2646)}

四是组织苏区群众甚至儿童团、少先队开展烧菩萨、禁敬神、砸祖牌等活动。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写道:“迷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打了土豪,分了田地,第一。儿童团、少先队的反迷信宣传,苏维埃的节省香烛钱运动,第二。儿童团(特多)、少先队的直接干涉(抹掉她们的香烛),第三……”^{[16](P314)}

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参与下,苏区的迷信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民国《瑞金县志》记载,中央苏区“极力破除迷信。见菩萨便烧,见敬神者,便将香烛饭馐,全部没收。民二十一年冬以还,各祠宇之祖牌,亦被破除付火……一切僧尼道士、巫师巫婆,在赤祸之初,即严行取缔。”^{[17](P249)}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苏区现在“没有人敬神,菩萨都烧了,庙宇祠堂变成了农民工人士兵的政府办公室,或者是游戏场。许多农民的家里以前供着家神‘天地君亲师位’的,现在也换以‘马克思及诸革命先烈精神’;从前过年庆节,写些封建式对联,现在都是写的革命标语……(敬神用的)黄纸店也倒了。”^{[1](P583)}

四、加大男女平等的宣传教育,废除了封建婚姻旧习,有力地动员了苏区妇女投身于火热的根据地建设之中

革命前,根据地区域内的妇女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不仅深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且还要受神权、夫权、族权等封建宗法压迫,不仅政治上毫无权力,连自己的婚姻大事

也不能作主。

砸碎束缚妇女身心桎梏,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首先通过完善法制建设,赋予并保障妇女同男子一样的权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承认婚姻自由,实行各种保护妇女的办法,使妇女能够从事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的物质基础,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的生活。”^{[3](P65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以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把“婚姻自由”作为其基本原则。另外,《宪法大纲》《中央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法规还赋予了苏区妇女与男子平等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如规定苏区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土地分配权、文化教育权。其次,为使苏区妇女树立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通过报刊、标语、戏剧、歌谣等多种形式加大了男女平等政策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苏区妇女投身于根据地各项建设之中。

一是加大了婚姻自由政策的宣传力度。《红色中华》等苏区重要报刊积极为婚姻自由营造舆论氛围。如,1931年12月18日第2期《红色中华》刊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一至十二条。^{[4](P18-19)}1934年4月26日《红色中华》第六版全文刊载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11](P3226-3228)}同时“劳动妇女解放万岁!”“打倒包办婚姻,实行婚姻自由”“打倒包办婚姻,禁止虐待童养媳”“维护妇女权益、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标语随处可见。

二是加大了男女平等政策的宣传力度。《红色中华》第11期、第12期相继发表了项英撰写的《关于婚姻条例质疑》、李伯钊撰写的《纪念“三八”与妇女工作应有的转变》等文章,文章明确强调,在政府动员下,妇女应自觉与男子一同参加破封建、消灭富农的革命中。^{[4](P195-212)}

1932年7月7日第26期《红色中华》刊登了人民委员会第6号训令《关于保护妇女权利与建

立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组织和工作》,《训令》强调:“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下农民妇女与男子一样的分得了田,在经济上妇女是可以独立的……苏维埃政府之下男女是一律平等的,不但劳动妇女在政治上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并且应吸收妇女参加政权机关的一切工作。”^{[4](P463-466)}《训令》在充分肯定妇女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的基础上,还对侵犯妇女权益的事件进行批评。

三是加强苏区妇女的文化教育力度。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开办识字班、读报班等措施,加强了苏区妇女的文化教育,提高了她们的文化水平,破除了她们的“精神枷锁”,增强了她们对党、红军、苏维埃政府的认同。歌谣《劝妇女读书歌》中唱到“……红军宗旨真正好,设立妇女夜学校,不要钱又贴油火……女人只为没读书,百般欺骗你要受,妇女们快快醒悟……醒悟醒悟快醒悟,醒悟快把书来读,读了书不受欺辱……人不读书目不明,做男做女都不行,写信算账要求人……。”^{[10](P409)}

四是加大了苏区妇女参加苏区建设的宣传力度。动员苏区妇女积极投入到根据地各项建设之中,既是巩固发展根据地的需要,也是觉醒其主体意识的需要。1933年9月21日第111期《红色中华》刊载了苏区女性解放运动的系列报道,如,《动员劳动妇女参加选举》《经济动员中的女战斗员,光荣的例子一个又一个》《扩大红军的女鼓动家》《妇女慰劳红军的奖励》《生产战线上的妇女》等文章^{[18](P2140-2143)},对苏区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慰劳红军、支持革命的行为进行大力宣传和赞扬,鼓励苏区妇女们为推进解放运动而奋斗。1934年6月14日第202期《红色中华》发表了《号召广大妇女走上生产战线来》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后方生产战线的任务,要更多的放到劳动妇女身上。”^{[7](P3501-3502)}

苏区的妇女解放运动,砸碎了套在她们身上的制度和思想枷锁,改变了她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增强了她们的社会主体意识,凝聚了革命和建设的力度。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

大会上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19](P332)}翻身得解放的妇女积极参与根据地建设之中,歌谣《劳动妇女学犁耙》中唱到:“对面桐树开白花,劳动妇女学犁耙,手拿犁耙翻翻转,学会犁耙好当家。”^{[20](P276)}她们由衷地唱道:“苏区妇女真自由,不缠小脚留短发,童养媳不挨打。望郎女仔自出嫁。家婆媳妇都有权,丈夫妻子过得甜。妇女翻身见青天,个个感谢毛委员。”^{[21](P341)}

五、加大社会新风尚宣传教育,革除了社会丑陋现象,有力地动员了苏区人民投身到社会风俗改造运动之中

社会风俗是一个地方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沿而成的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社会习俗,是一个地方社会文化和政治教化的重要反映,是当地群众精神面貌、文明程度、道德修养、生活质量的重要体现。^[22]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央的巡视报告中曾指出:土地革命前“赣南种鸦片者极多,即就兴国一县而言,遍地都是罌粟花。”^{[1](P402)}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发现:寻乌县城2684人,其中“游民270人”,“妓女162人”“商人135人”,“不工不农不商,专门靠赌博敲诈、为统治者当走狗吃饭的流氓,他们的人数竟超过商人一倍。”“若把游民和娼妓合计,便等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合计。”^{[16](P170)}可见,革命前乃至革命后的中央苏区所在地,赌博、吸毒、嫖娼、偷盗、妇女缠脚束胸、不讲卫生等陋习恶俗较为严重。这些旧习陋俗严重阻碍了根据地建设,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

对苏区的这些旧习陋俗,党和苏维埃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首先是加强社会风俗管理,如成立赤色警局,专门负责处理赌博、打架、偷盗、嫖娼、吸食鸦片等事情;少数地方(如瑞金)还组织儿童团,每人备一把削制好的竹刀,集体行动,去帮助农家铲(劈)烟苗。其次是通过颁布法律、政策、法令,为根据地社会风俗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促使根

据地的社会风俗建设规范化、制度化。如,在禁止“黄赌毒”等方面,中央苏区先后颁布了《为多种杂粮禁种毒品事》《禁烟禁赌条例》等法令,明确提出“鸦片是最有害的毒物,是豪绅地主用来麻醉工农的工具,我们苏区内,应当绝对禁止。”^{[23](P831)}在倡导健康生活方面,不仅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婚姻习俗,而且明令禁止三代以内的血亲、患有危险性传染病、神经病及疯瘫者结婚,明令禁止妇女穿耳、缠足、束胸等陋俗。在卫生防疫方面,中央苏区期间先后发布《巩固阶级战争的力量,实行防疫的卫生活动》(临时中央政府发出第2号训令,1932年3月)《开展卫生工作的训令》(中央军委,1932年7月)《卫生运动纲要》(内务人民委员部,1933年3月)《暂行传染病预防条例》(中革军委卫生部,1933年10月)等法令,对各类传染病的报告、隔离与消毒提出了具体要求,对死物秽物、腐烂物质的处理及公共卫生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此基础上,党和苏维埃政府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新风尚宣传教育力度。

一是在禁止种植吸食鸦片方面,《红色中华》不仅及时刊载了禁烟的政策、法令,而且还对相关条例进行了详细解释,多次强调吸食鸦片的不良后果,为苏区禁吸鸦片、禁种鸦片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二是在卫生防疫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明确提出要将此项工作“做成极广泛的群众运动,不管小孩子,老年人都吸收来参加……要使每一个工农群众,都能随时随地注意到卫生和清洁,注意到自己,同时督促别人。”^{[24](P68)}《红色中华》等苏区重要媒体除了刊载相关政策法令外,还积极介绍卫生防疫的相关知识,《大家起来做防疫的卫生运动》《我们要怎样来预防瘟疫》等科普文章,不仅分析了流行病发生的原因,而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预防办法,《红色中华》还专门开辟卫生专栏,介绍如何预防天花、疥疮、鼠疫、脑膜炎等疾病。

三是在培养良好生活习惯方面,苏区的文艺宣传工作者还创作了相应的歌曲,如《卫生歌》《戒酒歌》《戒吸烟》《戒烟戒辣椒歌》《赌棍歌》,这些歌

谣力劝苏区群众讲卫生,要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习惯,如《戒酒歌》中唱到“劝郎哥,要留心,眷恋酒碗性情人;立大志,作好汉,莫为酒鬼留罪名。劝郎哥,听分明,贪酒有碍事业兴;肯悔过,有法救,红军纪律最严明。劝郎哥,下决心,严重局面要认清;倡勤俭,戒奢侈,明朝迎接世太平。”^{[25](P157)}

中央苏区时期的社会风俗改造,有效地肃清了封建社会留下来的一些陋俗恶习,培养了根据地广大群众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开启了苏区社会新风尚。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书记在给中央的综合报告中说,经过社会改造,根据地境内“没有一个窃盗乞丐”,整个社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园无荒土,野无游民。”^{[26](P356)}

六、经验与启示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离开根据地后,江西省国民党政府人员到兴国县调研,感叹当地“虽无知妇孺工农,悉能唱之快乐歌、送郎歌、儿童歌、并能呼口号,如打倒封建、打破迷信、消灭豪绅地主,能说各样名词,如扩大红军、选举权等等不一而足。”^{[27](197)}中央苏区的社会改造不仅维护了广大群众权益,提高了苏区工农生活水平,而且重构了苏区社会秩序,促进了苏区社会发展,有力地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中央苏区的社会改造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这些历史经验对当前加强和创新社会建设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是坚持了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相统一。在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围绕不断壮大革命力量这一根本目标,把苏区的社会建设作为苏区革命的重要内容,在政治上、经济上保证了苏区群众的主人翁地位,建立了工会、农会、妇代会各类合作性组织,充分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种团体组织在社会改造中的主体地位。这一经验启示我们:新时代的社会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

既要发挥好党和各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好群众自治组织的自我管理职能,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二是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改造内容采取了不同的改造方法。如在社会游民改造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在政策上给予他们平等的土地分配权利和政治权利,鼓励他们自食其力,积极投身于苏区建设的洪流之中。当前,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人民群众的政治认识、价值观念、文化水平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因此,在社会建设中,必须从新的实际出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正视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新变化,针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不同的宣传动员内容和方式方法,才能有效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坚持综合治理,注重社会改造的系统性,既发挥了制度的规范引领作用,又发挥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动员作用。这一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社会建设的法律制度体系,为苏区的社会改造提供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发挥了《红色中华》等重要报刊的宣传动员作用,同时创新宣传动员工作方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有效地动员了苏区群众投入到社会建设的伟大工程之中。这一经验启示我们,社会建设必须注重系统性,只有把思想教育与制度保障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社会建设的强大合力,促进乡风民风的好转。当前在社会建设中,一方面要统筹规划,强化制度建设,把注重长远与兼顾当前、分工协作与突出主责、日常监管与重点检查、正面激励与反面惩戒有效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要在正面引导上下功夫,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增强宣传动员方式方法的鲜活性、新颖性和吸引力,进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健康生活方式、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实效性。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第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 [2]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
- [4]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1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5] 江西文艺编辑部.红色歌谣[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6]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7]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7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7册[M].北京:中国文献出版社,2011.
- [9] 白庚胜,向云驹.红色采风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 [10] 谢济堂.中央苏区革命歌谣选集[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0.
- [11]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6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2] 叶美兰,等.中华民国专题史:第7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3] 张品良.传播学视域下的中央苏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
- [14] 赣南师范学院,等.江西苏区教育资料汇编:1927-1937[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 [15]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5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6]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18]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4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19]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20] 中央苏区歌谣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 [21]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M].内部印刷,1995.
- [22] 肖小华.中央苏区社会风俗改造的必要性、经验及启示[J].探求,2020,(1).
- [23] 中央档案馆,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红色中华:第2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
- [24] 高恩显.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6.
- [25] 徐腊梅.红色歌谣[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7.
- [26] 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 [27] 江西省文化厅,江西省老年文艺家协会.江西文艺史料:第12辑[M].内部印刷,1992.

Social Reform and Propaganda Mobiliz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JIANG Yu-fang¹, XIAO Xiao-hua²

(1.Jinggangshan Revolutionary Museum, Jinggangshan;

2.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3436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masses to promote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e developm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 CPC gave priority to social refor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ith effective propaganda mobilization as leading force and practical system as guarantee. During this campaign, the party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and the masses played the dominant role. This campaign destroyed the old social system, broke the feudal patriarchal relationship, removed th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shackles, reconstructed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promoted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Social reform, Propaganda Mobilization; Experience and inspiration

(责任编辑:张梅龙)